

中西民主政治论

邱敦红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中西民主政治论

邱敦红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2·9

(京)新登字145号

中西民主政治论

邱敦红 著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北京安外六铺炕)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北京彩虹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17.5

字 数: 445千

印 数: 1~2100册

版 次: 1993年2月第1版

1993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7-5008-1237-X/D·203 (平)

ISBN7-5008-1238-8/D·204 (精)

定价: 10.50元 (平)

15.00元 (精)

中西民主政治論

王震



前 言

我本来没有写这本书的计划，只是在1989年秋发表《民主问题ABC》的文章后受到一些同志的鼓励，才有了写书的想法和行动。在此之前我就想过，理论是可以征服人心的东西，不重视理论怎么得了！于是盼着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问世。后来眼看国内的几次发乱和国外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演变都与“民主”有关，我便更多地思考着民主与社会主义前途的关系，认为民主问题已经成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斗争焦点，停留在“ABC”的认识水平上显然是不够的，一般地讲“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也是不足以服人的，不认真研究资本主义民主更是很难不陷入被动的。于是我发奋弄个究竟，也算尽一点“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责任。但是，由于我只能投入业余时间和有限精力，尽管作了最大的努力，本书也只能以现在这个样子与读者见面。

本书没有也不可能研究民主的全部问题，只是就当代民主政治中的有关制度和理论问题作一些研究，既难成体系，也未必深刻，权当“引玉之砖”而已。中外历史上对政治制度进行分类比较研究的不乏其人，但尚不多见比较东西方政治制度及其价值观念的研究论著，本人在这方面的努力或许也有尝试的作用。这里，“东西方”的概念并不是指地理分界，而是作为政治概念即社会主义与资

本主义的代词使用的。况且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和思想体系的千差万别，我们在研究西方政治制度时实际上只能涉猎其中具有典型意义的几种。美国是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首强和被认为有最精致的民主制度，英国是资产阶级革命最早然而又最守传统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法国革命的彻底性和法兰西民族的英勇精神在欧洲大陆独树一帜，日本则是兼有东西方文化特点的后来居上的资本主义富国，所以书中多以上述四国为例。

笔者以为，理论之所以能打动人心，是因为有其非同凡响的魅力。作为当代民主政治的研究论著，我不能不尽力追求理论深度。在探讨理论问题时，我是刻意求深求新求真的，以期有益于鉴往知来。然而，我又认为不应使理论仅仅成为文化人的奢侈品，那种脱离实际的理论，不被群众掌握的理论，是不能算真正的理论的。理论越彻底就越朴实，越朴实就越接近群众，越接近群众就越能显示理论的作用。把深刻的理论通俗化和将通俗的问题理论化，是我一向崇尚的学风和文风。

很显然，本书又不是纯理论性的，重点还在于研究当代的民主制度。不回避现实问题，不回避敏感问题，不回避矛盾，是笔者写作本书始终信守的一条原则。笔者认为，做学问就不能避实就虚，搞研究就不是轻描淡写，否则何须有劳理论工作者？越是迫切需要回答的现实问题，越是人们议论多、最关心的问题，越是不好说、很难说和不容易说清楚的问题，越要“碰一碰”。古人说：“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然而对于做学问来说，却正是“无限风光在险峰”。为了社会百姓，写人所不愿写之文，言人所不敢言之意，我以为是做学问的人应该提倡的风格和品质。

重视运用翔实的资料，用事实说明结论，我在写作本书时一般也是这样做的，但我认为做学问毕竟不能只限于资料汇编。一部学术著作如果没有作者的见解，满纸数据、引文、注释，看起来似乎琳琅满目，实际不知所云，读者依然不得灵犀。空泛的议论固然会

使人生厌，繁琐的堆砌同样会使读者乏味。笔者认为，著书立说既要占有丰富的资料，又要提出鲜明的观点；既要见事事，又要见人人（姑且不说作者的见解是否正确、深刻）。所以，结论与说明结论的材料相比，有时不能不占首位。材料往往只限于搜集，见解却要来自对材料的加工和研究；有了研究基础上的见解，才有文章的力度和“提神之笔”。

社会主义民主是对资本主义民主的扬弃，二者既有本质区别，又有历史的承继关系，采取“糟得很”或“好得很”的思维定式显然都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站不住的。本书并不企望所见都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惟愿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力求客观公正。我体会，有些问题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经济基础、阶级利益的角度去分析，就会看得更全面、更深刻；或者说，用历史的态度看待现实，用经济的观点分析政治，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看待抽象的价值观念，就可以有助于我们弄清许多问题的实质，以至于受益无穷。这也许就是做学问必备的科学、严肃、老实的态度。有了这种态度才能真正使我们知己知彼，既不自大，也不自卑，既不盲目崇拜，也不拒绝学习人家的长处。

曾经有几位朋友担心我写这本书会不会引起麻烦。我要感谢他们这种可以理解的好意，但我以为民主的时代是不会不让研究民主问题的，政治学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学科之一没有理由不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获得发展。对于我们党在四项基本原则之内倡导的“双百”方针和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我是深信无疑的。我以为，不可以讨论的只是政治原则问题，而政治理论问题是可以而且必须讨论的，或曰宣传有纪律，研究无禁区。不然的话，就很难有社会主义学术事业的繁荣。我的自信和内心的坦然还在于，只要以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就“心底无私天地宽”，既不会无原则地唱赞歌，也不会别有用心地夸大问题，而会本着严肃的、批判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社会责任感，来正视现实、提出问题和尽力“开

处方。”这种“治病救人”的积极态度与“把人诊死”的消极否定，是有本质区别的。还是那句老话：“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本书涉及的我国政治体制中的现存弊端及其改革设想，是不是出于善良的愿望，我想读者和时间是最好的裁判。

诚然，我始终不认为这本书的观点都是正确的，也不认为所用的材料和所作的叙述都是周详的。相反，由于受本人知识、学识、阅历和资料的限制，书中一定会有不少疏失、缺点和错误。特别是面对中国现在和未来的政治大事来发言，更难免不是幼稚、冒失、肤浅的。所以，我不仅希望而且将诚挚地感谢我的老师——同行和读者的批评指教！

我还要申明的一点是，倘若没有一些同志和朋友的鼎力帮助和支持，这本书无论如何是写不出来的。这里我要特别感谢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王树人同志、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宋国璠同志所给予的大量资料帮助；特别感谢任海清同志帮助誊抄文稿所付出的辛勤劳动；特别感谢王凤环同志为文稿的完成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全力支持！最后，我还要特别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的李松晨、张清濂等同志，没有他们的大力支持和指导帮助，这本书是不可能与读者见面的。对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王震同志能够拨冗为本书题写书名，更是令我感动和敬谢的。

作者

1991年8月于北京

绪 论

在当今世界，民主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了意识形态和内外阶级斗争的焦点，成了牵动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面对近年来国际风云的急剧变幻，人们不能不提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到底能不能搞下去？如果能，“民主”就不应成为资产阶级用来耀武扬威的“专利”；如果不能，共产党要认输的恐怕就不只是民主问题了。

人们应该记得，上个世纪中叶还在欧洲徘徊的那个共产主义“幽灵”，只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就在全世界230多个政党和组织的领导下变成了导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寝食不安的实际运动，并且以前所未有的气势在近20个国家奇迹般地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世界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的惶恐和守势，曾经激励过世界上多少民族和人民，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向往而长期牺牲奋斗！任何个人或任何少数人都可能犯错误，但是没有理由怀疑一代人的选择和一个时代的潮流。正是在社会主义事业生机勃勃的时候，资本主义却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包括凯恩斯主义在内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不得不重新审视市场和计划的价值观念。有谁在当时怀疑过社会主义的发展效率呢？有谁论证过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人权比社会主义优越呢？恰恰相反，正是社会主义的效率才

抵挡和战胜了希特勒向全世界的疯狂进攻；正是社会主义的效率所铸成的雅尔塔体制，才赢得了全世界半个多世纪的和平与安宁。现在尽管人们有足够的理由诅咒和摆脱社会主义的“僵化”体制，但是人们毕竟不能忘记，正是这样的体制才使苏联这个曾经被公认为欧洲封建社会堡垒的沙皇俄国，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即使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要用100年左右才能完成的工业化过程。我们无意一味地怀念过去和褒扬自己，也无心刻意贬低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从来没有宣布拒绝继承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人类优秀遗产），只是认为应该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历史，就会使我们多一点唯物主义，少一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我们中国人对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感受应该说绝不亚于其他民族，因为我国人民目前拥有的一切，包括民族独立、国家安全和尊严、人民生活的改善和综合国力达到世界前列等等，都是从1949年以后开始的。短短40多年（真正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实际上只有30多年）的时间，就给中国带来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什么还会有人怀疑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呢？社会主义为什么还会在今天面临这样大的困难以至于构成了对于自己未来命运的威胁呢？严酷的现实不能不要求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为此，我们又需要检讨过去。

社会主义原本是在最落后的国家搞起来的。它的成就虽然很大，但往往小于人们的期待，特别是对于那些总想“一步登天”而又很少考虑“登天”工具的人来说。一些人总是把自己的起点与羽毛丰满的资本主义放在同一天平上（而且仅仅与搞了几百年的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所以很容易把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国家经济技术水平的暂时落后，也归咎到社会主义制度上。于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带头挑起动乱的人有之；全盘否定自己、跪倒在资本主义脚下的人有之；对现实不满而对改变现实又表现得很不耐烦的人有之。尤其可怕的是，有些自诩“开拓”的领导干部，把本来

旨在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变成了偷梁换柱的“改向”。他们认为有了美元一切事情就都好办了，在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方面表现出庸俗的实用主义，令人惊讶地丢掉自己的优势和鄙视意识形态的作用，最终不得不成为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的俘虏。可见，堡垒还是易于从内部攻破的。50年代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改革时，为什么没有发生“信任危机”和丢权的问题？关键就在于党在领导改革开放事业中有没有足够的防范能力，在于党的领袖人物到底把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往哪条路上领。

诚然，社会主义事业也并不总是惊天动地的，它同时还会遇到甚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也预料不到的困难、曲折和磨难。还在社会主义刚刚诞生和成长的时候，资产阶级就想一口吃掉它；吃不掉以后就采用“冷战”、“遏制”、“超越遏制”等战略，企图搞“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在历史上强大到对资本主义构成威胁的时候，客观上也为资产阶级提供了不寻常的帮助，促使他们在危机中根据国家资本主义原则对自由资本主义进行了调整。为避免腹背受敌，他们一定程度地缓和了阶级矛盾，大搞“福利主义”，并且与国际资本携手合作，发展经济，扩充军备，大搞科技革命。社会主义在历史上发生困难和挫折的时候，他们则大肆活动，一面积极推销、“出口”自己的价值观念，一面提着金元吸引这些国家向“自由世界”靠拢；不接受他们“恩赐”的条件时就对你进行制裁、禁运和封锁，或者接二连三地通过“议案”干预别国内政。社会主义就是这样艰难地走过来的。而且对于我们来说，走的又是一条前人从来没有走过的路，长期“摸着石头过河”不能不更加步履维艰。无论是可以避免的错误还是难以避免的错误，最终都不得不记在共产党人的账上，以至于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和抵消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时也给国内外敌对势力提供了更多的进攻余地。本来，社会主义不再“输出革命”和实际上早就不对西方构成威胁以后，各国人民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就是最基本的民主、自由、人权，但这就

是得不到他们的“允许”。你不对他“输出革命”，他却偏偏要对你“输出民主”。这就叫“树欲静而风不止”，人家亡我之心不死，你能忘记他们的存在吗？在阶级社会里，只有阶级成份和斗争内容及形式的改变，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会改变的。

按照马克思主义揭示的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社会主义的发展本来同样是通过解决生产力发展的矛盾实现的，但是，由于有人历来将社会主义的矛盾与社会主义的发展对立起来，并且有意无意地拿社会主义的矛盾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相比（或者企图通过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解决社会主义的矛盾），于是加剧了共产党人解决社会主义发展的矛盾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在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兴起的时候，人们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和对老一辈共产党人克己奉公、艰苦创业精神的崇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克服和弥补社会主义运动中由于主客观原因造成的困难和失误。然而，理想和热情终究不能长久代替制度的完善，终究不能掩饰由于某些人的腐败和贪婪带来的对于社会主义的不信任情绪。“有而不知足，欲则失其度”，在落后国家步入现代化的过程中，人们有了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改善也不会感到满足，相反还会由于这种需求层次的全面提高而带来新的社会矛盾。所以，社会越发展越会产生发展着的多样性与原来习惯中的统一性的矛盾，生活越改善越会产生需要与可能、期待与现实的矛盾。当这种矛盾一时找不到妥善解决办法时，人们就会由对欲望的不满足变成对社会制度的不满意，一有风吹草动，就很容易干出冲动多于理智的事。因此，骚乱在一定意义上是一切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矛盾现象，社会主义目前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有很多就是社会主义历史发展过程中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武装起来的共产党人，当然不会因为承认社会主义的矛盾而否认社会主义的发展，而是确信解决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

世界上的事情往往是复杂的，多变的，很少有人都能先知先觉，

一览无余。谁曾预想到，始于1640年的英国革命，在经历48年以后才形成“光荣革命”，而到1745年确立内阁制，英国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的较量实际上用了105年的时间才见分晓。法国革命从1789年算起，先后经历过五个共和国、两个帝国、12部宪法，资产阶级中有谁因为出现这些历史曲折而否定过一脉相承的资本主义制度呢？然而，面对目前社会主义出现的困难，资产阶级却大肆宣称：共产主义“大失败”了，“终结”了，他们“不战而胜”了。笔者认为，作出这样的结论恐怕还为时过早。目前的事态尽管还有某些不确定性，但已经明朗的问题也不妨有我们自己的认识和判断。

其一，社会主义在目前所处的低潮是社会主义事业前进中的困难和曲折。从现实来看，这只是成熟的资本主义与年轻的社会主义对比发生的失衡效应；从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来看，仍然是年轻的社会主义更有前途。

其二，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完善不能代替人们主观上的失误，主观上的失误也不能代替客观事物的必然发展。如同资本主义不可能由美元来统治一样，社会主义“大家庭”同样不可能靠卢布来支撑。革命输出主义的失败并不等于革命理想的失败，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否定也不等于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

其三，社会主义首先是本国人民的事业，国家民族利益优先并不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背叛；只要能把本国的事情办好，客观上就是对世界无产阶级和进步事业的支持。一定条件下的退却是为了一定条件下的前进，目标接近实际是人们认识水平提高的标志。曲折中孕育着发展，低潮中孕育着高潮。从矛盾的运动规律来看，这依然属于“否定之否定”的历史发展过程。

其四，矛盾运动的结果，总是会带来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变化。眼前的困难既可以成为社会主义事业新发展的契机，也可能由此一蹶不振甚至走向灭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势力最终难奈我何，

但我们自己的事情倘若办不好，客观上势必帮他们的忙。

当然，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我们不是把自己的命运建立在天赐良机 and 善良愿望上，而是把它建立在对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本质认识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从世界格局来看，目前变化的总规律依然是相对均衡势力的发展，通过不均衡发展的演变，最后实现新的相对均衡势力的矛盾运动过程。或者说，目前的世界格局只是打破了原来相对稳定的两极均衡体制（雅尔塔体制），经过一定时期（如到本世纪末）不均衡的演变，最终（如在下个世纪初）形成相对均衡的多边新体制。美国、西欧、独联体、日本、中国、其他地区联盟和有组织的第三世界力量等，都将成为未来世界格局中的重要力量而互相制约。今后国际阶级斗争的特点，有可能由过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更多地表现为国家、民族和地区集团之间的利益对立。各种复杂的利害关系和日益加剧的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如美俄矛盾、美欧矛盾、美日矛盾、欧日矛盾、西欧国家之间的矛盾，一国内部执政党与在野党的矛盾、政府与议会的矛盾、政界与商界的矛盾、官方与民间的矛盾，等等，有可能为我们提供更多的生存空间和发展余地。从各自战略利益考虑，任何一方都不会无视一个很有发展潜力的强大中国的存在。他们很可能始终对我们实行“又打又拉”的两面战略，而我们也只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才有可能争取较长的和平发展时期。这里有必要灵活运用毛泽东同志曾经倡导的又团结又斗争、分化瓦解、利用矛盾、有理有利有节等斗争策略。社会主义既然要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很长时间，那么对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既要作为我们高度警惕的对象，又要作为我们对外开放和发展对外关系的重点；既要设法改善和发展同它们的关系，又不要对它们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除了国际因素和客观形势以外，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存和发展，最根本的还是要靠自己的内在生命力和创造力。古往今来，多少代人对于“人为什么要活着”这个古老而朴素的命题进行了不断的探

索，作出过各种解答。从康帕内拉设计“太阳城”到康有为写《大同书》，人们对于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私欲、没有贪婪、人人平等公正的社会的追求，不能不始终是一种幻想；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将这一切变为现实。“人活着不仅需要面包，而且需要阳光和真理。”这句宗教名言吸引着多少人把自己的精神追求寄托在“神”的名下了，然而只有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一扫了前人的空虚、孤独和狭隘。无论资产阶级怎么炫耀自己的价值观念，它所拥有的精神遗产无论如何也不能代表人类文明的最高目标和追求方向。没有剥削、没有两极分化，生活有保障、不受失业和其他不安全的公害的恐惧，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尊老爱幼、见义勇为、先人后己、先公后私等社会主义的社会风尚和公共道德，与根源于私有制的剥削、两极分化、失业和损人利己、唯利是图、尔虞我诈以及抽象的民主、自由、人权等观念相比，无论如何要崇高得多，永恒得多。大抵可以这样说，资本主义制度中好的东西，社会主义基本上都能学得过来；而社会主义好的东西，资本主义不一定能学得过去。社会主义眼前遇到的困难、挫折和失误，决不是社会主义原则、理想和道义的失败。只要这个世界上还存在剥削、贪婪和不公正的社会现象，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之一的精神文明和价值观念就永远不会过时，就永远具有感召力和吸引力。

应该说，我们中国人对于社会主义的感情尤其要比其他民族深厚，因为中国人民的真正独立解放是伴随着社会主义运动实现的。如果说中国革命是在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日益尖锐的基础上不可避免地发生的话，那么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同样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每一个正直的中国人都不能不承认，我们国家、民族和个人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取得的。即使眼前与最发达国家相比，经济、技术水平还落后一些，然而逐步地赶上和超过他们，笔者认为只是

时间问题。没有理由说中国近40多年来的发展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却有大量事实表明，恰恰是这40多年（特别是近10多年）使我们大大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如果不是客观上没有经验和主观上犯过错误的话，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肯定要比现在表现得更多、更大、更深刻。如同历史上的任何困难都没有动摇过我们的信念一样，眼前的困难也决不可能使我们“认输”。把别人的困难当作自己的胜利，终究是靠不住的。我们中国人认定，尽管我们已经取得的成绩还是初步的，但我们所从事的毕竟是能够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事业；完成这个事业尽管还会遇到许多预料不到的困难，但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也有办法去克服它们。我们的这种信念决不是任意允诺，而是历史的趋势，是对社会主义潜力和光明未来的笃信。

毛泽东同志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仍将是我们事业取得成功的两个基本保证。40多年来，成绩是在党领导下取得的，敌人是在党领导下战胜的，困难是在党领导下克服的，错误是在党领导下纠正的。党过去能够领导中国人民改天换地，党也一定有能力领导社会主义的未竟事业。当然，我们也必须实实在在地承认，党内一部分同志无论思想理论水平还是政治业务素质都不是那么合格或者根本不合格；日趋盛行的关系网、人情风、拜金主义、官僚主义、以权谋私和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已经使一些地区和部门的党纪党风涣散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党的确不如毛泽东时代那样能够管住自己的干部了；党的威信、形象和号召力已经令人痛心不如过去了；一些人消沉、苦闷、观望以致离心离德的思想情绪实际上还没有扭转过来。上述问题如果不在短时期内得到根本解决，势必成为我们目前和今后面临的最主要的危险。

毛泽东同志当年离开西柏坡在进北平的路上对周恩来同志说，今天是进京“赶考”，我们决不当李自成，希望考个好成绩。他们这一代人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点上的确是被人民打了满分

的，现在我们在改革开放和权力考验面前能被历史和人民打多少分呢？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归根结底是人民的事业，离开了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和支持，党不仅会一事无成，而且势必一败涂地。因此，立党为公，立党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最根本的党性，以党性换民心，以民心求稳定，我们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为此，我们在执政党的建设方面敢不敢抓要害问题，敢不敢“碰硬”，敢不敢“动真格的”，并且真正建立起一套谁都不能违反的制度和纪律，这不能不是我们党生死攸关的生命线，不能不是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关键所在。

当今世界，无论社会主义者还是资产阶级，都是不会在自己的未来命运面前消极被动的。我们说社会主义拥有未来，前提是社会主义者要面向未来。资本主义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在它原有的框架内经过自身调整由痛苦走向了成熟；社会主义在落后国家的建立和发展，也只有根据不断发展的生产力及时调整生产关系，才能由不完善走向完善，由初级阶段进入成熟阶段。因此，党必须善于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及时提出新的任务和主动领导改革开放事业。但是，务必使全党明白，在不完善的社会主义与成熟的资本主义时代搞改革，就难免有一部分人主张搞资本主义。正是由于改革与社会主义制度同在，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人又与改革同在，所以社会主义的前途不能不始终与社会主义改革的成败息息相关。这里，要害问题是改革的领导权掌握在谁手里。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优劣比较或者说最终解决谁胜谁负的问题，归根结底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工作如果搞不好，不仅社会主义制度搞不下去，人民的幸福、国家的安全、民族的尊严等等一切都谈不上。因此，千方百计地把经济搞上去，任何时候都是涉及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头等大事。然而，社会主义事业同时也是塑造民族形象的全新事业，单一的经济标准是不够的。必须看到，我们在政治和文化建设方面存在着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特点。西方的